

▶ 學者觀察

震後原住民山區小學的校園文化表徵與再現

震災後における山間地帯の原住民小学校の文化的表現と再現

921지진재난이후 고산 원주민 초등학교 문화표현의 재발견

The Symbols and Reappearance of Campus Cultures at the Aboriginal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Mountains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

文 | 許家彰 (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講師)

這幾年，台灣山區的學校建築變漂亮了，這是大家普遍的印象。但是到底該如何解讀這些原住民學校的轉變過程，則是本文的首要任務。本文試圖以「文化象徵 (Cultural Symbol)」的概念，來探討幾間原住民學校：它們的建築師如何「選擇與處理」原住民山村小學此種地域性建築的轉化原則；並試著解釋這些於921大地震後出現的新校園建築形式，對於當代學校建築類型發展的時代意義。

殖民式與軍營式的早期校園建築

台灣的學校建築從日治時期開始，就有著注重「象徵形式」的傳統，具體表現在校園空間上。從小至精神標語的掛牌擺設，到大至具有符號圖像的設施空間，學校建築的功能不再僅是教育機構，它還被賦予了傳達國家機器價值觀的重任。日本政府在處理文化融合的問題上，就用了很細緻的方法來凸顯學校建築的象徵形式意象，例如將學校設置在靠近神社附近，藉由「鳥居」這個顯而易於連結日本母國文化的象徵性符號，強化了殖民的正當性。

國民政府遷台後，由於在中國戰敗的陰影，政府對於學生教育與學校角色的設定，明顯是以規訓與管理等社會化要求為教育目標。反映在學校的空間發展上，軍營式甚至類似監獄式的校園規劃，名正言順地出現在各級學校建築裡，並形成了整齊劃一、大量被複製生產的「標準化」建築形式。

原住民學校建築 部落的文化象徵

對於沒有文字傳統的台灣原住民而言，需藉由空間認知與文化辨識的過程，來建立屬於這個部落共有的象徵與集體記憶。最接近學校空間象徵的應該就是昔日部落社會結構裡的「少年會所 (Takuban)」：每一個孩童，透過在這個場域裡的互動機制得以辨識、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空間與權力關係。

而現代教育的學校角色，某種程度也可視為「少年會所」體制的「延伸」。因為，做為傳承文化象徵性地位的現代原住民學校建築，除了必須具備現代教育基本的空間功能性外，更擔負了另外的角色：它必須能夠透過一種可



日治時期，藉由「鳥居」突顯學校建築的象徵形式意象。(Credit unknown, *The Educ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Schools*, 1967)



國民政府時期，大量被複製生產的「標準化」學校建築形式。(圖片提供：許家彰)

被理解的文化辨識途徑，確認部落的文化象徵主體與自我認同 (identity)。因此，當我們要解讀山村裡的原住民小學時，必然不能忽視文化象徵對於學校建築設計的影響。只是在「詮釋」文化象徵的形式途徑與空間秩序重組的課題時，建築師會採取哪種「選項」進行轉化與再現？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。

圖像詮釋學

忽略建築應是由內而外的連續過程

台灣從光復迄今的原住民學校，幾乎走入圖像詮釋學 (iconography) 的路徑，常見的作法有二：早期是直接複製原住民的圖騰藝術，以泥作的方式貼附在有著規格化教室的現代建築的樑、柱上；另外一種，則是更進一步採用折衷主義 (eclecticism) 的方式，把各種足以代表原住民文化的視覺象徵元素，進行拼貼組合。

這二種作法的問題，在於完全忽略了建築應是一個由內而外的連續過程。這種以視覺的記憶連結方式，硬被套在一個標準化的現代校園空間裡，仍然無法區辨出原住民的文化差異性，原因可能就如 Charles Jencks 的分析：

「當它與其功能相關的一套意義結合時才能得到最佳效果，比較成功與失敗的作品之間：差別就在於可能寓意的數量，及其功能的關係」。

潭南國小再現布農家屋

一種可被意會的學校建築解法

更重要的是，校園空間型態並未配合部落民族差異或辦學理念進行調整，因此921地震前的原住民學校建築，仍無法給人耳目一新的印象。本文首要討論的潭南國小，在地震後重建的當下，標舉著「再現」布農族的家屋「原



台灣的學校建築從日治時期開始，就有著注重「象徵形式」的傳統，具體表現在校園空間上。學校建築的功能不再僅是教育機構，它還被賦予了傳達國家機器價值觀的重任。



潭南國小從家屋意象轉化成之外觀造型。

(圖片提供：姜樂靜)

型」，「傳遞」布農文化「風格」為學校建築設計概念。這種操作策略迥異於上述的傳統學校建築，因此我們將針對該案進行解析，試著找出這套新的設計法則，提供哪些可被部落與外人意會的學校建築解法。

潭南國小是一所位處南投山區布農族卡社群的小型學校，全校成員皆由在地布農族子女組成，這個民族最被西方世界認識的文化象徵就是「八部合音」。進一步觀察「八部合音」的唱法與精神，即可知道，布農族是一個內斂的民族，這種重視和諧之美的風格，明顯也表

達了人際之間的某種秩序關係，此一共同的意志反映在美學上，就是一種樸素的內在意涵的表達。

所以，布農族並不刻意突顯圖騰、裝飾、記號等外在差異性，反而追求的是內在和諧共融的抽象美。這種特質，其實與台灣其他原住民(如排灣族Paiwan)重視視覺記憶的既定印象有著顯著的差距。潭南國小的整體設計，從基地配置、學校空間組織構成到外觀造型設計，確實也緊抓著與「傳統布農文化」對話的概念進行。



布農族並不刻意突顯圖騰、裝飾、記號等外在差異性，反而追求內在和諧共融的抽象美。潭南國小的整體設計緊抓著與「傳統布農文化」對話的概念，以之做為學校建築的形式推導來源的方法，為原住民學校提供了一種可能性。

文化辨識與形式自主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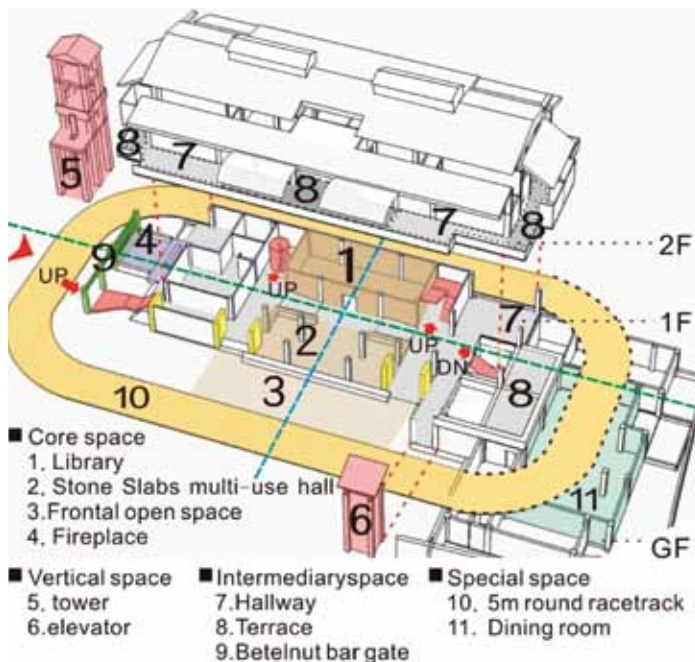
現代原住民小學設計的新規制

潭南國小這種強調與布農族文化對話，以之做為學校建築的形式推導來源的方法，為台灣山村的原住民學校提供了一種可能性。以下我們以其他幾間分處不同部落的原住民小學的建築解法，說明「文化辨識」是有機會成為設計原住民學校的重要形式途徑。

就Amos Rapoport的研究，設計表達的途徑至少有3種：記號學模型、象徵性圖像符號與利用人類學或民族學所發展的非言語交流方法。很明顯地，大部分位於山區的原住民小學皆能符合上述觀察。我們從「文化決定論」的設計態度與轉化強弱度，選定7間原住民學校，比對分析它們如何在建築規劃與空間組織上，創造出有別於平地小學的「獨特性」文化象徵的特殊設計（見表一）。

利用建築語言 展現文化辨識度

潭南與民和這2間得到遠東建築獎肯定的國小，分別在表一軸線的兩端，正說明了兩者分別代表了2種截然不同的設計態度：「文化決定論」與「環境決定論」。兩者所呈現的外在形式同樣具有豐富的建築語言，在空間組織的創造上也同樣能夠突破傳統學校空間。因此，有趣的問題則是，哪一種才「適合」在地原住民的學校風格？哪一個才「符合」現代原住民的學校象徵？我們認為回答這個問題的前提，就在於觀者與創造者的文化「辨識度」程度深淺上。若我們把另外5所小學一起加入比



潭南國小從「布農」家屋為原型，在學校空間構成上進行類比。

（繪圖：許家彰）

較，則更容易看出主導者所創造的各種空間與建築元素，是依循在對於文化象徵的辨識度上的。

表一的下部分，整理歸納這些學校，在形式引用來源與轉化上的基本態度。在處理建築形式的問題上，我們將之分成2種類型來分析：一是「視覺圖像轉化」，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「實質空間轉化」。前者處理二度空間元素的問題，後者則是處理實質學校空間如何呼應文化象徵的問題。

當然，這兩種類型都有在處理手法上是否為「直接」或「抽象」的問題。所以，還可以再區分兩者的差異性。對照表一圖示即可清楚得知，潭南國小在文化辨識與地域主義的推導下，呈現豐富的視覺與空間轉化的處理。而以環境決定論為設計原則的民和國

小學名稱		潭南	互助	平靜	親愛	古樓	春日	民和	
原住民族		布農族	泰雅族	塞德克族	泰雅族	排灣族	排灣族	布農族	
形式引用來源		文化決定論						環境決定論	
空間轉化	學校空間類型	原住民文化辨識與設計轉化層次							
	設計準則	強 → 弱							
表一：原住民學校建築空間類型與形式轉化	直接引用	校門象徵性							
		上學路徑	校門-牌樓-大樓梯-二樓走廊	圖騰柱-操場-波浪型樓梯-迎賓道-川堂	校門-轉角塔樓-川堂	石板道-花園-走廊	弧形坡道-內庭-走廊	校門-穀倉-塔樓	通道-草坡-走廊
		非正式交流途徑							
	抽象類比	自然生成							
		日常慣習							
		特定儀式性							
圖像轉化	編織圖騰								

小，巧妙避開文化象徵的問題，僅以通則性的解法處理形式的問題，所以它幾乎沒有「視覺圖像轉化」的問題。

學校空間與文化象徵相呼應

位處南台灣屏東的大武山是屬於排灣族的分布範圍，春日國小與古樓國小的建築形式，自然與排灣族文化有關。觀察這兩間學校最清楚的形式類比，就是「穀倉」這個重要的空間原型。春日的作法是把「穀倉」類比為「圖書館」，它是學生學習最重要的空間，因此它被放在學校基地的核心中央。而古樓國小則相反地把傳統「穀倉」是用來裝種子的實質特性，轉化成「種子教師」的概念，在校園入口明顯的區位，把「穀倉」類比為「行政中心」。

互助、平靜、親愛國小是屬於泰雅族的分布範圍，該部落外顯、英雄崇拜的文化特性，使得這3間學校充滿豐富多元的建築元素應用。以互助國小為例，它善用地形，把酋長型司令台與祭典圓台、圖騰柱迎賓道、波浪樓梯、草坡整合在一起，形成一個緊湊、具有多重隱喻及使用性，更可以促發各種活動的一組空間串。親愛國小是姜樂靜建築師的另一個作品，該案除了炫目的塔樓、吊橋、酋長型司令台等元素轉化外，最值得討論的就是教室單元的創新，獨立的2間個別教室共用1個小花園、廁所的作法，可以類比自泰雅族獨立分散各自生活的寫照。

新式校園建築 原住民族文化形式的再現

本文所討論的幾所原住民學校，可算是南島原住民族文化形式在「現代」社會「再現」的極佳典範。從台灣的南部到中部、從地震後的重建學校到今年完工的古樓國小，我們認為一種以類型學為建構模型，透過與過去文化形式的對話過程，所產生的學校建築設計方法已經開始出現；它也提供了一種新的原住民校園建築形式的想像空間。而關於「形式的聯想」，我們認為最困難的地方就在如何找到一個恆常的、可被大眾接受的「文化原型」，這當然牽涉到創作者主體認知與詮釋客體形式的態度。◆

本文為作者已發表之期刊論文部分內容，全文請詳見“Representing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Aborigines: A Case Study of Reconstructed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wan”,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/ May 2010



許家彰

高雄市人，1965年生。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、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所博士。近年主要的研究議題皆集中在「地域性」學校建築的空間形式解析上，試圖透過地區文化象徵性的建構過程，釐清台灣鄉村型學校建築的發展

樣貌。初步研究成果，包括中南部原住民小學與六堆地區客家小學的案例分析。



幾所震後重建的原住民學校，是南島民族文化形式在「現代」社會「再現」的極佳典範。「形式的聯想」涉及創作者主體認知與詮釋客體形式的態度，如何找到一個恆常的、可被大眾接受的「文化原型」是最困難之處。